酷儿全球化 / 女性情欲乌托邦

欲望隐形轰炸机： 新兴国家中「异己」(Alterity)全球化之现象

Cindy Patton 原著
庄瑞琳译，何春蕤校订

1990 年代初期，台湾有一小群年轻人等候与精神科医生进行面谈，以证明他们是同性恋，不适合服兵役。不幸的是，到了 1993 年，美国有关军中男同性恋的辩论广受瞩目，也引起台湾官方人士的注意，此后等待面谈的年轻人虽然在名目上获准以同性恋的理由申请豁免兵役，但是官方不鼓励他们宣告自己的性身分，因为那已经不足以构成免役的理由。这个政策转变的确实原因至今不明。

台湾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也许只是仿效其他新兴民主国家，在社会议题上采取很明显开放的立场，以借此展示其现代性(modernness)，或者至少借此与邻国的种种野蛮作为以及自己的过去保持某种距离¹。事实上，台湾在更早一个阶段宣扬比较开放的性规范时就

¹ 例如，后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把情欲包含在被保护阶级的诸多表征之一，这显然与过去种族隔离时期规范下的情欲形成断裂，也承认了黑人与白人同志解放者在反种族隔离抗争中的积极努力，这似乎也暗示了新的南非会以其他民主政体中的错误与疏漏为鉴。同样地，以色列也取消了对同志不利的军中规则，以浇熄军中至少在许多犹太人以及部份世俗主义者圈子中必然出现而且高度被看重的恐同症。而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前，东德对于同性恋采取极度开放的态度，不仅包含了女同性恋的子女津贴，也给予同性伴侣某些公模式的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正在挣扎着调和二次大战后声称是自由民主的西德与身为共产主义继承者的东德之间面对同性恋时的态

已经使用过这个策略，赵彦宁(1996)曾指出，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展现自由开明形象的方式，就是强调台湾对同性恋并没有什么严厉的法律规范，而据说大陆则常常监禁并处决同性恋。不管怎么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现在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回应少数者的请愿，时至 1993 年，台湾只有一个几乎没有多少能见度的同志运动，根本比不上美国那个组织有素、要求重新审视兵役政策的同志公民权运动，再加上军队总是和国民党戒严令联想在一起，因此，我们很难想像台湾的同志运动会和美国的同志运动一样要求加入军中服役——恐怕，逃离兵役才更能够表达新的民主情操。

矛盾的是，1993 年台湾的这个政策修订表面上看来是提升人权，事实上却是先行解甲了以认同为基石的解放政治。因为这么一来，不宣告个人的性倾向（即使在属于半隐密性质的精神科医师面谈中也不说），就与国族主义、亲政府（也就是亲国民党）的情操连结起来；新政策不但没有使国家更民主，反而使「酷异」(queerness) 距离新兴解放政治愈来愈远²。那些国族主义的、亲政府的情操当然

度差异。

² 在过去几年当中，台湾的政治积极份子与「一般的同志」对于几个从英美引渡而来的字词使用，如"lesbian"、"gay"、"queer"与"homosexual"等，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当媒体为了某些特殊的目地选用了某些字，以及当台北市政府借由找寻一个字词来表现他们追寻西方民主政体的意图时（也许只是预先阻止类似像 ACT UP 或者 Queer Nation 所可能引起的骚动？），整个名词上的斗争显然只会更为复杂。为了避免 queer 这个字成为我个人误读的牺牲者，或者是在此类政略所引发的门外汉提问之下被牺牲，我选择保留 queer 本身的罗马拼音而不加以翻译。我将把某种称之为系谱学与意涵探究的工作留给我台湾的朋友来完成，也就是试着去找出并且呈现那些不断被在地变动、创新、起源式的，与媒体为了不同异己政略上的需求而强加之上的标示部份。这让我联想到 1996 年我在台湾以英文进行演讲时所发生的趣事，当

对军方不构成任何威胁（虽然在其他部门可能导致不快……例如在1995年以来民进党执政的台北市政府所形成的新秩序中……），因为男同性恋已经被军方纳入，至少不再受益于曾经免除他们兵役义务的官方政策，因此，1993年的男同性恋请愿者不但没有如预期的被询问有关他们变态欲望和偏差实践方面的问题，反而被愤怒的质疑他们的国族情操：

「你根本不爱国！你一点都不关心你的国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义务！你倒底有什么毛病？你难道不知道美国的男同性恋多么「渴望」服役吗？」³

对于新兴民主政体中不被当成社会运动的性异议份子或是他们受到全球瞩目的美国友人而言，这看似黑色幽默的场景背后隐含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到底性解放的论述是如何扩散的？而当它抵达某地时又成就了什么？表面看来，上述例子似乎是某种人权全球化的胜利，因为国家竟然在没有本地行动者的情况下代为传达了「公民权」；但是想起来岂不令人心生惊惧？一个国家首度认定其同性恋公民的方式，竟是把他们视为炮灰！这就是晚期现代同性恋公

时我的翻译者与我自己都认为以「同志国」来表达"queer nation"是个相当好的翻译方式，然而很不巧地，一个来自香港的同僚却以一种有趣（却也算妥当）的方式合并了看起来似乎是同音异义的两个字。在不熟悉美国性政略的状况下，他把 queer / 同志听成是同侪（peer），于是同志国也就成了同侪国（peer nation）。于是这个用法就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许又从英文被翻成中文也说不定。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身为一个美国人〕决定不再去为 queer 这个字寻找一个最接近的中文译法。

³ 关于这则在台湾军方历史中的小插曲，我是从几个曾经亲身经历这个奇异的事件或者认识别人曾经经历过这件事的人那儿得知的。所以，括号内的嘲讽之语大概与真实状况相差不远。

民权的致命讽刺：他（某些情况下是她）被准许服役，但军方并不保护他（她）的情欲权益。

自从美国独立革命之来，军队的使用与组成——有时是要募兵，有时是征兵——在美国政治上就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许多美国人相信，二次大战后军方的种族融合措施为其他工业中的种族融合铺了路：看哪！黑人与白人可以一起共事！当时的战争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暗示大家逐渐感觉到有一种跨种族的理解在曾经一起服役的人身上浮现。依循着这样的逻辑思路，而且当被军方驱逐的同性恋者对军方提出喧腾一时的诉讼之后，同性恋公民权运动份子在 1980 年代后期开始主张，或许军队也可以是一个公开「融合」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工人的好地方。这个策略在阶级政略上是相当重要的：对许多贫苦的农村美国人来说，服役是唯一可以习得技术或者获得资助读大学的途径；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做法也代表在这个领域内积极推动就业运动，已有象征的进展。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同志运动在收养子女、公职就业歧视、与社会福利津贴的分配等议题上都与国家进行抗争，然而美国的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同时也宣称自己是「好公民」(good citizens)，他们只希望国家可以实现人人皆享有自由正义的许诺。这么一来，还有什么比变成一个愿意为众人自由而牺牲性命的爱国者更好的方式，来标记这个最新被肯定的新公民呢？

显然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过分低估了这个策略可能意外招致的不利后果，因为柯林顿政权最后竟以（由同志公民权辩护律师所交涉出来的！）「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的含混政策，终结了兵役争议⁴。可是，连这个大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受到军中势力

⁴ 新政策使得在军中询问性倾向成为违法，同时也禁止军中人员以行动或是

的反弹，军中对疑是同性恋者的迫害增加了，另外，好几桩「同性恋」士兵的暴力事件被悄悄的归罪于：他们只是不满「被强迫」与同性恋一起服役⁵。积极运动份子与社运学者因而从这个插曲中学到

文字的方式来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这个相当复杂的政策引用了最高法院以及地方法院一连串相当矛盾的判决，也就是他们试着去区分，认同，是声明自己的认同或是直接行动，而行动也牵涉到有没有混杂着同志认同，是说了还是没说。事实上，过去试着在自由言论的律则（性认同在此处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政治言论）下争取个人有宣告性倾向权利的案例都是被抹灭的。这样的言论（或者简直等于是宣称的明显行动，这也是言论的一种）所可能导致的分裂性结果，在潜在的层面上是比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更危险的。原则上，总是在不见光处安静行动的男同志或是女同志，根本就不会去违反这个政策。虽然这解决了在旧政策的提问下因为隐瞒了「曾经是」同性恋的性倾向而被军方驱逐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却还是有可能因为声称、或者是被别人宣称是同志，而同样遭到驱逐的命运。也就是说，因为关于某个人性倾向的流言可能引起某种公共讨论，所以与「说出」无异，然而在法律上，在实际的字词方面，其实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要问他是不是，不要说你是不是」这句话，目前在美国的庶民言谈中已经被广泛的使用，这种使用不仅援用了它本身的荒谬性，而且更广义地来看，它指的是一个人在没有自我供认的状况下却只能被当成某种人的无奈。

⁵ Arthur Dong 在 1997 年拍摄的纪录片《特许谋杀》(Licensed to Kill)，描述了八个犯下反同志谋杀罪的人，其中对于 Kenneth Frank 中士（被派驻在北卡罗莱纳州 Fort Bragg 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有相当杰出的刻画。在实行「不要问他是不是，不要说你是不是」政策之后没多久，French 中士感到日益的心烦意乱，因为他认为一旦同志（尤其是男同志）被准许在军中服役，整个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状态都会趋向衰微。在一个喝得烂醉的夜晚，他来到了一家地方上的餐厅，而这家餐厅并不与同志社群有任何的连结关系，只是一家离他自己家很近的餐厅，他一进门便不断地扫射，一边咒骂着柯林顿总统与军中的同志人士。然而死亡的四个人与受重伤的七个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是同志。在与 Dong 先生访谈的过程中，French 中士说明他选择目标的抽象性，他承认到现在还是反对军队中有同志，事实上他就是不喜欢同志，可是他现在了解在餐厅开枪杀人并不是表达政治言论的好方式。Dong 先生也问他，面对现在因为他的行为而陷入恐惧的同志社

两个教训：

1)不同的压迫虽然在受害者的经验中感觉起来是「同样的」，但是压迫的手法却是经由结构上各自独特的机制来生产与维持，所以一个少数群体所争取到的利益并不能快速地和逻辑地转换给其他团体共享。在民主政体中，这可能有一部份是出于主流的「容受性」(receptivity)，也就是主流会出于明显不同的「情绪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来回应它以不同方式压迫的不同群体的诉求。

2)一个团体达成特定公民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对随后寻求同样目标的团体来说，可能还必须被再次经历，因为，没有什么通往公民权的高速公路。连黑人公民权都是个二十世纪甚至二次大战后的现象，这暗示同性恋政治运动的 50 年历史时间还太短暂。黑人公民权运动几乎用了 270 年的努力才产生了像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这样的黑人爱国者，被美国白人大众所接受，甚至民主、共和两党都想找他担任副总统候选人。⁶

对于那些期望从美国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同志运动）寻求榜样

群，他会说什么？Dong 先生希望 French 中士能够了解他反同志社群的行为已经是一种恐怖主义了。French 中士显然迷惑了....他停了一会儿才说：「我绝对不是真的想这样做的，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不是真要伤害他们，只是对于这个政策我有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而已。」

⁶ 黑人不但在美国独立革命中与英国人一起对抗殖民地，同样的也替殖民地服务。黑人不仅在南北战争中参加了北军的阵营，同样地也参加了征服新大陆与其后殖民占领的大小战役。但是却一直到韩战（这次战役是中苏关系在 1950 年代重新定位之后与美国交手的产物）的时候，黑人与白人才能在同一个部队、同一艘舰中服役，然而在职位上仍有差异。

或是前车之鉴的人来说，某种面对美国国内政治时的乐观取向具有很重要的蕴涵。在美国的脉络里，追求公民权的努力常常被号称"queer"的政治所批判，但是在此我想要提出，虽然新兴民主国家学习「歪想」(think queer)是件令人兴奋而潜在有用的事，但是美国queer政略的出现有其脉络，它对基进政治的机制与可能性会带来多少虚假的希望，值得再思。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公民权的各种策略在现今美国的政策辩论中只能为同性恋赢得有限的正当性；在实际修法方面，过去三十年的努力成果几乎等于零。不论是好是坏，这种缺乏实质保障的可见度，使得「权利」固化为最主要的性异议模式，也成为最后底线：很少人愿意放弃追求权利而去支持无法保证成功的"queer"政略。在另一方面，台湾才刚刚开始公开辩论任何形式的权利，queer运动有能力而且也正在为台湾的性异议份子塑造政治策略——毕竟，建议以虚拟的 Queer Nation 来对抗台湾国，绝对有其吸引力！但是在美国浮现的 Queer Nation 与 queer 理论似乎不可能处理这个岛屿的领土脆弱性，后者可能随时被一个更大的实体以和谈或武力的方式所占领。对台湾来说，queer 理论的确提出了崭新的方式来想像空间、国家与政治，然而美国 queer 国族主义者引以为当然的两个重要关键要素，在台湾要不是非常边缘，就是存在在非常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下，这两个关键要素就是：1)公共空间，作为展演的地点；2)明显的解放式认同身分，以便对应建立反认同主义的政略。

以台湾的脉络而言，由于此刻正在进行多边的国族身分与独立问题的辩论，因此有好几种形式的 queer 理论在台湾浮现。但是这些 queer 理论都是以先于公民权 / 认同政略的角色出现，而不是作为公民权 / 认同政略之回应。对于在地「酷儿化」(queering)的努力而言，我们很需要去思考它们如何复制了或者是脱离了那些有关美

国政治及其政治空间概念的假设，也需要检证国族和认同在台湾（或以色列或其他地区）是否是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被酷儿化。事实上没有所谓真正的在地 *queer*，「酷儿化」总是不断地与异性恋国家机器磨蹭，而酷儿化也确实有可能磨损异性恋国家机器，它的操作形式之一可以用理论来说明本地如何可能生成与国族相左之身体⁷。但是美式 *queer* 理论在异地时差中搞不清楚今夕是何夕，它降落时发现本地根本没有主流同志公民权论述可供骚扰，因而感到手足无措；而且，不管「*queer*」一词在台湾本地运作得有多好，美国的积极运动份子都绝不可因为自己的性政略明显的全球化而沾沾自喜。美国的 *queer* 政略若是想维持像它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前卫」，就必须维持反普同主义者(*anti-universalist*)的姿态：也就是说，所谓「别种」的 *queer*，并不是从一个标准的 *Queer* 衍生出来的在地变种。「酷儿化政略」(*queering politics*) 在坚决对抗认同政治的某些成份时，必须随时批判自己对这些成份紧抱不放的程度有多少。西方的积极运动份子很难想像不谈权利的搞政治——虽然很多时候这些权利也只不过是当成更激进的说法的替身而已。

面对跨国性的社会力，「新兴民主国家」采用权利论述作为表现「现代性」的途径之一，可能事实上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至少，当它以欧美的国族模式来超越并且对抗本地原有的宗教、族群、或替代性的政治哲学——如儒家思想——时，这些「其他」的力量或

⁷ "Queer"应该要扬弃「自然」的概念，即使在英文的原意上，这个字的确暗含了一种与正常的、「纯粹的」客体呈现直角关系的意涵。"Queer"这个字是来自一个过时的旧字，将它重新改造成一种严重的辱骂，并且以「嚣张的差异」(*being-different-in-your-face*)这样的意涵重新被使用。而当我了解「同志」这个字词是共产党用语的嘲弄性变种，我几乎马上接受了这个具有摩擦性的字眼，虽然它本身具有的性别含意也许较为稀少。

许会像新加坡的回应一样，也就是把欧美殖民主义的丑陋现实等同于潜在可以孤立的、启蒙式的权利概念：用货真价实、用本土价值等等同样有力的论述，来击败西方的权利概念。另外，国家政体与超国家体(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bodies)也要求新兴民主国家以权利修辞来展现它们连结上了由欧美主导的「国际社群」，因此，如果我们要想让「权利」概念产生在地的意义，就必须积极去搅扰国家政体与超国家体对新兴民主国家提出的这个要求。特别在媒体报导方面，跨国媒体集团常常只选择报导某些「违反人权的事件」，以丑化那些不受欢迎的国家，而同时暗中抬高那些「人道国家」(如美国)的身价。这个被各个违反人权国所赖以比较的模范，其实非常言行不一：到底哪个国家的公民享有这些虚幻的权利？

国族思维(Nation-thinking)

1700年代末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族」(nation)——更确切的说，好几种不同的国族——诞生了。美国是由一些富裕的、没有遭受太多压迫的殖民地所组成的民主制宪国家，法国是从君主制转型成为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国家，海地则发生革命，推翻了奴隶主，建立第一个后殖民国族。新专业阶级取代了帝制，混血种的被殖民人民推翻了殖民母国，愈来愈多受管地独立建国，经过几个世纪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都被「国族」所接管了。即使「亚洲」的空间承受了很不一样的帝国统治、帝国扩张、以及欧美殖民宰制，终究还是被整合进「国族胜利」的故事中。但是就如同许多学者所提出的，这些不同形式的国族事实上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从欧洲人眼中看来杳无人烟的原住民土地上所开创出来的国家。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几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国族

会成为地缘政治组织(geopolitical organization)中最主导(也最具优势)的形式。首先,半独立的印刷资本主义(semi-independent print capitalism)的发展,使得四散各处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存在于一个共延的(coextensive)时间里,例如:来自不同地区的新闻报导被置放在同一页上,这助长了大家形成一种意识,认为「在别处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后来」才透过「新闻的传播」而得知的,而是「此刻」就在发生的。这使得跨地区的政治共识在识字的中产阶级中得以形成,并使得大家更意识到国族就是一个社群——不管这个国家认同(安德森称之为「想像的社群」)是否只存在于假想的空间中。生产这种国族共时性(national simultaneity)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大家愈来愈觉得那些不活在「国族」之内的人是活在过去,是原始的,是存在于神话的而不是世俗的、公民的时代。第二个让国族成为主导形式的原因是,当原本以神学为本的正当化模式(modes of legitimation)向民粹的/民主的正当化模式转进时,虽然这些非神学的手段不一,国族却随之而生。最后,安德森宣称,国族概念使得所谓「政治爱」(political love)浮现,也鼓励了这种针对想像的国族和人民而产生的情感增强到一个地步,竟然促使二十世纪上百万的士兵为了国家与自由的概念——而非为了个人获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此我想扩充安德森的观点。一旦开动,国族逻辑就意味着只能有「国族」:没有任何空白空间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想要「世界秩序」的玩家。我把「国族」这种不断繁衍新国族的倾向称为「食土症」(geophagia),这种食土的冲动往往还伴随着某种宣成式的整体主义(performative wholism):也就是说,一旦「国家」(Nation)衍生成一整群的国家(nations),它也会同时衍生成一个像国族社群(community of nations)般的「后设司法实体」(judicial meta-entity)。例如,由于缺乏正当性来拒绝英王的统治,美国的殖民地居民于是

想像出一个更高的上诉法院，这个上诉法院不是一个由支持坏国王改为支持好人民的神只，而是一个由各个国家的公民所组成的全球社群。当然，在美国建国的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国族（不管联合与否）存在，但是那篇即使到今天依然被政治异议份子所效法的《独立宣言》在提出主张时，听起来真好像有某种联合国法院供它请愿似的！也就是这种宣成式的整体主义才使得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能够在最近几年一起加入多国的和平维持部队，而那些年轻军人不再是因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爱」而牺牲生命，而是服务于那个普遍的国族概念。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想像模范国族(Model Nations)，也可以想像一个有可能违反国族地位基本判准的后设国家武力(meta-national military)。大部分当前的讨论都暗示，全球化是一种在国家之上发生或是透过国家而运作的过程。我个人则主张，*国族不仅生产了也体现了*全球化之论述行动与物质行动；事实上，自从它道成肉身以来，国族的概念就直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族概念的「全球化」；国族的概念需要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在这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内在于国族本质：从逻辑上来说，全球化先行于国家。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情境多么不同，尽管财富容许拥有动武的能力，然而最基本的政治争论还是在于：哪个国家才有真正国家的正确样子。而有关性的各种政策在此过程中占有一个奇怪的位置——特别是对那些缺乏物质或政治权力的国族而言。在情欲议题上保持看来极端现代的立场，似乎是新兴民主国家互相竞争的唯一途径。

国家(Nation)的内里？

台湾可以说是个蛮特别的国族（或者，只是一个「国家」），它持续的被殖民，而终究（1949年）在美国的帝国监看之眼下，重新被想像为流亡政府的中心。虽然台湾在领土上被东西方各国视为边缘，然而各方的政治论述却都以台湾为书写的稿纸，这些论述曾经使东方受制于西方，使东方脱离西方，曾经殖民了东方，也解放了东方，更曾经使东方局限于自己，与自身分离，内部殖民自身，或解放自己。而另一种更有意思的说法是，台湾也是各方复杂利益的着地点（或许不是唯一的着地点），而这些利益目前不但框架了国族概念，更威胁着要拆解这个基本概念。

以国家兴亡的传统观点来看，台湾的历史就是一本先是被邻国，后来被较远的征服者入侵的历史。它目前的政府（某一入侵势力在解严后之承继者）一直到最近才不再等待胜利返回真正的故乡，转而将台湾视为家乡，这个一度有超空间的政府已经慢慢地接受了现实，承认它所拥有的实际领土其实远少于它以为它所拥有的。1970年代台湾被偏爱共党中国的联合国剥夺了席位，而共党中国不论在政治上或特别是漠视「人权」问题方面都显然是与二十世纪晚期的国族概念相反的。目前的台湾是一个现代模范国族（君不见我们甚至准许同志在军中服役！），逐渐有了新方式去维持面子，因为——影响力已经不再与领土或扩张紧密连结；现在，影响力与文化（亚洲性质、现代性质）及掌握商机（迷你化、快速传送、拷贝抄袭）相关。

目前美国是在国际的情欲辩论中最响亮的声音，而基于台湾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当我们考量国家与情欲在全球化力量的脉络中之命运时，台湾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案例。全球同志政治极其怪异的加速发展，有一部份是由于大家将爱滋病固执地与性偏差（或性

殖民主义)相连,因而导致对性的戒慎恐惧,然而这种加速发展在台湾似乎更为极端。美国及国际同志政治发展得最好的那几年,台湾当时还处在戒严的状态下,但是戒严状态并没有全然驱逐——仅仅只是策略性的过滤——人们对美国事物的欲望,因此,由于复杂的政经情感因素,美国对于台湾的左右派而言都有着关键性的角色,不过当然出于不同理由。身为典型的国族、人权的宣传者、新社会运动的开创者、以及位居混种欧亚风格与知识份子品味之全球化漩涡中心,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是被认同的对象。

如果如安德森所言,美国是第一个国族(first nation),是第一个想像国族的创始风格,那么台湾就是最后的国族之一。美国的中心问题意识一向就在于如何打造一个合法的起源;台湾的中心问题意识则是在于怎么去解释政治结局——尽管它的后现代经济与文化机器愈来愈强。台湾是非常前卫的,它悄悄的选择在全球市场上(几乎自由的)操作,而不再认为国家最好统一在公民契约之下。美国人不能直接购买台湾上市公司(例如面对日、美电脑制造商时深具竞争力而且发展相当良好的宏基)的股票,但是台湾的各个公司却会在其他证券市场中贩卖股票;台湾在极其重要的美国金融市场上透过各种基金来中介其官方立场之阙如,台湾公司则透过持有这些基金而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贩售股票。即使面对 1998 年得了流行感冒的亚洲市场与汇率崩盘,台湾仍然保持某种程度的成功。这揭示了一个事实:国族正在以下这个三层次的侵袭中分崩离析:

- 1)透过法人关系的超级资本主义网路(市场的全球化),
- 2)透过国家之间的超国家社群,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与超国家社群平行之非政府机构团体面目(人权的全球化),

3)透过那些渗透官方界线的身体与概念，而且在国族论述的收编叙事眼界之外（异己的全球化）

讽刺的是，对那些在台湾发展性异议政治的人来说，人权的全球化可能是上述现象中最有问题的。国族是透过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异同的浓淡层次来表述自己，国族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则被视为一种「先国族」的力量(**pre-national force**)，被视为一个普遍的状态，在各地都强烈要求推动官方的异性恋。但是大家也都承认，情欲与国家的串链是不完全的：官方处理残余异性恋的模式，有时是展现国族现代化的判准，有时则是战场。例如，全球的爱滋论述都把男同性恋铭刻在反歧视论述或权利论述之内，女性主义的全球化也在北京非官方组织会议中将女同志写入人权论述之中；但是另一方面，透过权利论述，在不承认在地酷异的前提之下，新模范国家也彻底地将「性异己」(**sexual alterity**)医学化：同性恋者之所以有此刻的可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落入爱滋之下。

在很多情况下，经由人权全球化而形成的美式同志认同的全球化，对于土生土长的 **queer** 们来说，其实是一种障碍；就像国族的观念，西式同志解放论述是透过「发展理论」(**a developmental theory**)来理解何谓进步，并将政治异议赋予意义。事实上，诉求「认同」和「公民权」，就是诉诸一种先前的匮乏状态，但是此刻却从这个匮乏状态发展出一种新的完整性。「**Queer Nation**」以它已经既存的存在感，以及位置 and 自我的完满，几乎打破了把基进政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捆在一起的桎梏。然而在美国，女男同性恋的可见度——人权的再现面向(**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既是如此沉闷与毫无生气，**Queer Nation** 当然广受瞩目：不少同志的小孩很可爱、会打篮球、会拉小提琴，学业成绩甚至比那些异性恋父母的小孩更好，可

是，不管是不是吓到了某些家伙，比起这些乏味的同志邻居来，**queer nation** 有趣的多了。老实说，面对奇装异服、满身穿洞戴环、跩得要命的同性恋，或许有点吓人，但是总比看电视转播愈来愈多的反同性恋政客的选举结果或者地方或国家法规的公民投票结果来得刺激。

不管我们相不相信唯物主义的的目的论，或者信不信政治在左右两极中的摆荡之说，美国的政治积极份子一个最普遍的自我体认就在于，我们的运动总是迸发在与「历史」的辩证张力之中。我们诉说我们运动的故事，总是和我们诉说自身生命的故事同一形构的(**homologous**)：在个人方面，曾在阴暗之下的我们，如今终得以重见光明；在运动方面，我们曾经遭遇过一些并非有意的副作用（例如女性主义的种族歧视，反种族歧视主义中的性别歧视，可能在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中出现的阶级歧视，在两者中都存在的恐同症，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阶级歧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但是如今我们好像也已经找到了某种机制，可以建立相互负责的连结。不管运动是真的前进或只是在一连串重复的倒行中前进，这些故事都把社会运动的敌对姿态镶嵌在历史的辩证过程中。然而那些形塑出无声背景以生产美国内部异议存在意义的「历史—社会」情境，还是很难脱离以下的诸多概念，如联合国、全球经济关系、以及经由欧美殖民主义发展出的人权、大历史与在地时间的争战。

不管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的在地运动有多重要，也不管他们依着所在的地方不同而形成内部殖民或是外部殖民，美国同志运动在海外的积极份子尽管强调在地运动的重要性，却还是无法脱离历史主义的紧箍咒。他们的直接行动都发生在人权全球化的脉络中：透过政策渗透（特别在表面上是客观中立的美国爱滋流行病学），美

国式的性观念快速的传布至整个世界，甚至比 *queer* 飞行于世界的速度还快。这些不同层次的论述产生两个效果：其中一种效果倾向于认为在殖民政权尝试控制「本土的」情欲之前，本土情欲是没什么问题的；另一种效果则相信「本土的」情欲一直是无法被说的、是被压抑的，一直要到解放者抵达之后才帮助他们说出自己的话来。这两种说法现在正在爱滋论述中互争长短：在地政府倾向于援用前者的说法，认为不管过去在人口上有过什么问题，爱滋随着西方同性恋或性观光客的身体抵达时都为本地强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致命愉悦。然而同志团体或者那些相信同志团体所提供的分析的跨国团体，则倾向于接受后者的说法，认为同性恋总是存在的，只是未被思考的、未被正名的，因此他们的解放有赖于同志认同的公开宣告。有趣的是，这两种倾向都假设本土是异己、是匮乏的，觉得本土需要将有关人权的超越性论述与本土要求释放的呼声连结起来。

酷儿化人权，女性化国族

(Queering Human Rights, Feminizing the State)

在美国，「权利」的概念落实了《独立宣言》的承诺。第一批权利是由美国宪法所揭示的，但是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个文献限制了所谓「不可剥夺的」能力不能被某些特定、可被辨识的阶级所分享。（事实上，最初的公民资格概念明确的排除了奴隶、已脱离奴隶身份的自由民、贫穷的白人、及女人。）《权力法案》及其后的修正案本来是想解决上述问题的，但是即使在开国之初，经济政策及教育机会都明显地预先排挤穷人与非裔美国人执行他们应享的基本权利，所以 1950 年代才有了一个有关种族歧视的新论述出现，为新的立法和行政结构奠立基础，以发掘、评估并且（偶尔）解决这些缺

失。而当这个新的民权法律和投票行为开始施行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其他被排挤团体要求分享权利时所采用的模式；现在美国的同志民权运动就以「嫌疑阶级」(suspect class)的身分来要求权利，这些要求目前还在透过一连串不同的民权策略，以进入司法程序⁸。由于民权立法策略的强调，以及它所形塑出来的「像个少数民族」的团体感觉，同志认同遂逐渐发展出类似族群的情感(ethnic-like affectivity)；另外，过去也一直都有其他说法来理解 queer 之间亲密连结的起源与特质——包括古典的友谊形象、希腊式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式的同志爱(Edward Carpenter 以及其他人就认为同性恋是最完美的公民，因为他们可以效忠于国族，而不是效忠于家庭！)

但是在台湾，「人权」观念的诞生有很深刻的女性主义意味，更甚或呈现某种女性化(feminizing)的倾向。至少在 1990 年代初期，台湾的同志相当依赖女性主义与新兴女权论述的援助⁹：新生的同志

⁸ 「嫌疑阶级」(suspect class)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意指共同拥有某一个特征的人所形成的团体，并且这个特征在法律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当民权法案在二十年前出现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诠释也相应而生：确认的行动、对少数团体的非歧视却非积极性的供给、津贴纲领(特别是在职业训练与住宅问题上，改善过去教育上的劣势与居住上的隔离政策)。此外，隐私权的保障也同时出现，不过是根据另一种不同的法律案例。言论自由有时与传统的公民权法律策略呈现相当吻合的状态：如有穿传统民族服饰的权利、有批评政府种族政策的权利或者说某个人是同志的权利，全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被确立了。而目前，不管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或者是职业上与居住上的阶级歧视，在美国的某些地方都被放置在国家的层次上来讨论。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相关但不是相同的案例上却往往有相反的判决，甚至于因为同性恋而赋予「胜利」好几种不同的定义与地位。(如 1993 年在华纳的 Janet Halley)

⁹ 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性别与情欲的关系一向相当的复杂，而且 queers 与女性主义者的合作状态也不甚稳定。在 1998 年，部份是因为对于

运动就是透过性别异议的框架来形塑自我，或是间接的在反对与家庭合作的立场上成形。而由于「权利」是被理解为违背国族营造计画 (state-building project) 的，同志权利因此是反阳刚的 (anti-masculinist)；这么一来，一种与国族背道而驰的情感就正在浮现，以作为社会政治的方式。如果要了解「权利」对台湾同性恋的意义——不管是拥抱权利概念的同性恋或是选择某种更像美国 queer 政治的同性恋——我们就必须继续追踪台湾女性主义政治的发展。

正如同施群芳所揭示的，在台湾的选举政治所形成的新公共领域中，女性主义急切的呼声一直都极端的复杂。过去国民党的女性成员在立法院运作，而她们的民进党对手则是以宽广的「人权」政见进行运动，至少在某个范围内，女性是向选民提出这类议题的前锋，这也使得人权未言而明的女性化了。可是对进步的左翼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尴尬的是，后来竟然是新党籍的女性律师推动立法院通过了修改民法。不过，即使是女性主义政治也能有「queer」的认知：曾经有一位女性候选人〔许晓丹〕从国旗上割裂的破洞中穿越而出，将她的政治诉求空间化。透过这个举动，她不仅从国家认同的象征出走，从国家认同的象征中激烈诞生，而且也进一步的超越了、毁容了国家认同的象征。

我们必须要小心：台湾的女性主义发展虽然受到日本与美国相当大的影响，却仍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发展轨迹（如果真有一条路迹存在的话）。就美国女性主义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1970年代（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的状态）基进女性主义的出现是对1960年代学生

台北市公娼与青少年自由的法律地位辩论，而引发了女性运动中进步派女性主义阵营与国族派女性主义阵营的分裂，伴随着这次的分裂导致了 queers 与进步派女性主义阵营的再度结盟并且各自维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

运动和解放运动组织方式的延续，也是反动。而由于理解到自己的根基是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半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是在 1960 年代「后恐共」的各类运动中出现的，她们一直希望能够把女性主义的**第二波(second wave)**回归一个比较唯物论的分析方式，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历史辩证过程是没有办法在台湾述说的：因为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内部指涉可能的状况之下同时抵达台湾的。

就连**第二波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形成的全球化认同，在台湾都有问题。因为美国基进女性主义的**国族冲动(nationalist impulse)**——例如由女性生产、为女性制作的商品和服务，就推动了一种**资本主义分离主义式的女性主义(capitalist-separatist feminism)**——并不会困惑跨国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后者是寻求透过阶级政治来和男性连结。事实上，有另一种更为明显的**国族主义**，以及另一种和看来比较左的**社会主义**不太一样的历史关系：由于建立在新中国的概念之上，统一的严重问题又尚未解决，因此台湾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二者都连上了阳刚的**国族建造(masculine state-building)**。然而，在美国所看到的女性主义却必定是个**反国族**的——或者至少是很**女性化**的——计画。美国政府的女性化并不是在国族不稳的战争期间发生，而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中发生，至少在民主党的「向贫穷宣战」或者共和党的「与美国有约」之前，罗斯福总统所提出的社会纲领重新划分了公共与家庭的界线，重新把政府的角色想像为**超级妈妈(mega-Mom)**。相较之下，台湾此刻在面临这种政府角色重构的问题时，却还要同时面对另一个问题：国家主权（更别提国家认同）都还完全未决。

公共 / 私人（或者家庭）空间之分的概念是美国争取性自由时所依赖的基石，也是 **queer** 政治的表演所环绕的核心，而这个公共 / 私人（或者家庭）空间之分在台湾是截然不同的。在台湾，空间的形塑基本上不是以阳—阴 / 公共—私人这样的美式对立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在戒严末期所产生的人权论述事实上也就是在书写「公共空间」与「隐私」的变动观念。对那些想和欧美人士一样享受人权的人而言，人权的要求同时包含了有赖「公共空间」概念的「言论自由」，以及需要「隐私」的「性自由」。虽然新的空间——如迪斯可舞厅、卡拉 OK、MTV 酒吧、土生土长的边缘媒体、环绕在中正纪念堂四周的广场等等——正试图同时满足两者，但是都还未透过「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这样的社会记忆来固定下来。

社会形式（如家庭）的式微、资本化媒体强大流通管道的铭刻、自由民主政体被合法化成为政府形式等等——这些被大部分西方政治理论家视为当然或者认为应该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必要条件，产生了美国同志解放运动。但是在台湾，这些条件要不是大部分不存在，就是和各种解放运动同时抵达，于是我们很难把同志或爱滋政治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描述成是从家庭的压迫经验中断裂出来，也很难把这些政治行动当成打造半公共空间以形成社群的运动。或许我们还是能够书写某种台湾系谱学（透过儒家思想以及孙中山对于儒家思想的启蒙改造——加上蒋介石所强加其上的基督化了的社会场域和列宁式的政府模式），但是这些系谱学绝不会类似从石墙事件到 **Queer Nation** 的长征故事。

身在何处？(Queer and Where?)

最近大家开始用电脑绘图来展现波士尼亚确切的地形图时，就

会发现传统的纸上地图已经无法解决各方在真实生活中的空间竞争。山坡或是洼地在纸上地图里往往是模糊的，可是对于居住在当地的人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事情。Sedgewick 就注意到，「作为国人」(being a national)的感觉，必然是在国族与居所(habitation)之间日日活出来的关系中形成的；对那些觉得政府远在天边的人或者那些一时激情关怀国族认同的人而言，边界的实际位置其实意义不大。这种对于准确标示领土的要求，并不是对于政治空间的固执妄想，而是企图把那些可能在国族认同的语言中思考居处的人的住所收入（或排除！）在版图之内（外）。为了完成宏观政治协商的目的而发展出来的国家空间迷你化，愈来愈精确，而这只不过凸显我们对于巩固国家领土也愈来愈疯狂。

所以，我们的关注点都错了。

伴随着情欲的全球化论述而来的空间感与领土感——不管它们降临时已经和欧美版本有多不同——早已在超越了各种有关国族的概念。就像前面提过想逃过兵役的台湾同志的故事一样，对性异议而言，占有空间的能力不如把握时机(timing)来得重要。或许会出现另一种想像的社群形式，它不再去想像指涉的领土，而是去想像某种持续的时间(duration)、磨损的状态(defacement)、与非合法的偷猎侵占(poaching)。后现代的空间盘据并不是在联合国的国族概念之下运作、与其对立、或平行前进，而是拒绝再想起那个执意硬性发配我们身体的国族。

透过全球化机制来迁徙的性异理论述（特别是同性恋解放理论和 queer 理论），其命运又会是如何呢？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在本地实践的各种情欲、以及透过媒体炒作 queer 风潮、和在爱滋政策讨论中活用扩散的跨国性论述之间，有何种关系？我们要如何在一方

面去理解全球与在地的相互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去观察这两者与（中介、连结、或搅扰两者之互相掌握的）国族之间的关系呢？

情欲论述的波涛飘移，与其说是像在全球资本主义轨道上开行的火车头，倒不如说是像在假设的虫洞中穿移的迷航星舰。身体以多重模式带着论述一起移动：他们也许带着酷异(queerness)前行，并把它种植在从未有过这类东西的地方；也许他们偶然来到一个新地方，并且发现他们刚好契合某种规则而被命名为 **queer**；有时论述的抵达会先于那些决定接受 **queer** 的身体；有时某个地方会先留住 **queer**，直到身体准备好要 **queer** 化。随着资讯科技的全球流动，被身体携带、被网路魔地(MUD 或译「泥巴」)传送的 **queer** 全球化，总是像个搭乘免费便车的种籽一样，附着在官方企图阻止疾病扩张的论述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它往往反过来威胁到国族想像自己的方式。如果「**queer**」这个字有任何用处的话，它最好不要被当成认同和实践的模范，供人在本地仿效或形塑；而是作为一种证据，证明有一种无法阻止的异己，正在像隐形轰炸机一般，在国族的毁灭性监视萤幕之下飞行。

参考书目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Chao, Yengning. 1996. *Embodying the Invisible: Body Politics in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esbian Identities*.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Dong, Arthur. 1997. *Licensed to Kill* (film). Los Angeles, CA: Deep Focus Production.

- Halley, Janet E. 1994.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sexuality," in Michael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in the Age of Wilde," in Andrew Parker, Mary Russo, Doris Sommer, and Patricia Yaeger, eds.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Warner, Michael, 1990.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